

21世纪决策参考丛书

[美] 丹尼尔·贝尔 著

后工业社会的 来临

——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Daniel Bell

新华出版社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美〕丹尼尔·贝尔 著

高铢 王宏周 魏章玲 译

高 铢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美) 贝尔 (Bell, D.) 著; 高铨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7

ISBN 7-5011-3614-9

I. 后… I. ①贝… ②高… III. 后工业社会(经济学) N. F03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9387 号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Copyright © 1973 by Daniel Bell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Basic Books, a division of

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 (国际)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美] 丹尼尔·贝尔 著

高铨 王宏周 魏章玲 译

高铨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7.75 印张 445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3614-9/F·520 定价: 28.00 元

译者的话

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是中外历史上许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所热衷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社会变迁加速，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这些因素推动未来研究与发展研究日益结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与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发表以来，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各方瞩目。

丹尼尔·贝尔在40和50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同时还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社会学。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史》、《美国的新右翼》等。在60和70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同时，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有关的活动：曾任《公共利益》杂志二主编之一；担任过《代达罗斯》和《美国学者》杂志编委；1964—1966年在美国总统的“技术、自动化与经济进展委员会”内供职；1966—1968年担任美国政府“社会指标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966—1974年担任美国文理科学院的“2000年委员会”主席；1976—1979年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未来计划”的政府间顾问委员会美方代表，后任美国总统“80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在这20年中，他的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基本权利》、《极端右翼》、《普通教育之改革》、《今日资本

主义》、《走向 2000 年：进展中的工作》、《大学的对峙》、《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1980 年发表了《曲折的航程——社会学历程论文集 1960—1980》。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思想始于 50 年代末。1959 年夏季，贝尔在奥地利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使用“后工业社会”的名称，提出了他对未来西方社会的设想。其后，在 1962 年和 1967 年又写了《后工业社会：推测 1985 年及以后的美国》和《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I] 和 [II]。1973 年出版的本书对“后工业社会”的思想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和实例分析。他提出“后工业社会”的五大基本内容是：（一）在经济上，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二）在职业上，专业与科技人员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三）在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居于中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四）在未来方向上，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重视技术鉴定；（五）在制定决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术”。1976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本书的姊妹篇，它着重从文化角度继续探讨“后工业社会”。贝尔在该书的《前言》中对两本书的重点与配合作了说明，他说：两本书具有辩证的关系，互为补足。《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力图说明，技术（包括知识）和理论的高度集约化，正成为创造发明和制定政策的新原则，日益改造着技术—经济体制和社会的阶层体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则“讨论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并讨论在社会价值观强调欲望不加节制的情况下如何管理复杂政治形态的难题”，“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是由于曾把文化与经济维系在一起的绳索已经散解，由于享乐主义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影响。”

西方学术界论述未来社会的许多见解在贝尔影响下套用了“后……”的前缀，以表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新类

型社会的开始，有些描述未来社会的名称虽未使用“后……”的前缀，但也受到贝尔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下列的名称中可以窥见这股思潮的概貌以及贝尔的突出影响：

-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 后资本主义社会——拉尔夫·达伦多夫
- 后资产阶级社会——乔治·利希特海姆
- 后现代社会——阿米泰·艾特齐奥尼
- 后文明社会——肯尼思·博尔丁
- 后集体主义社会——萨姆·比尔
- 后意识形态社会——刘易斯·福伊尔
- 后传统社会——艾森斯塔特
- 后市场社会——汤姆·伯恩斯
- 后组织社会——汤姆·伯恩斯
- 后经济学社会——赫尔曼·卡恩
- 后大规模消费社会——赫尔曼·卡恩与安东尼·威纳
- 后匮乏社会——《社会政策》杂志
- 后福利社会——吉迪思·绍伯格
- 后自由派时代——杰弗里·维克斯
- 新工业国——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 技术电子社会——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 规划社会——阿兰·图雷纳
- 多面社会——克拉克·克尔
- 技术社会——雅克·埃吕尔
- 超工业社会——阿尔文·托夫勒

这些未来预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以当前突飞猛进的科技革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贝尔对未来西方社会的探索中，从技术分析联系到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权力中心、管理体制等方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现代的科学正在经历一

场巨大的革命。面对这场重大的科技革命，不但要重视其经济影响，而且要重视其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影响。贝尔已看到西方社会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巨大动荡之中，现有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都在迅速消蚀。因此，“时代終了感”是当代西方社会特有的文学形象。他预感到“后工业社会”会带来一整套新的匮乏和一系列新的问题。

丹尼尔·贝尔这部名作定将引起读者们的巨大兴趣和深入思考。

本书翻译分工如下：序、1976年版前言、第一章、结语——高铨，导论、第二、三、五、六章——王宏周，第四章——魏章玲。全书通校由高铨负责。

高 铨

1997年7月

1976年版前言

“后工业社会”一词很快在社会学文献中流行——不论是好是坏，有待观察。就某种意义来说，接受这个词是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一旦看到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许多国家都可以界定为“工业社会”的时候，那么就必然把主要从事采掘自然资源而不是从事制造的社会划为“前工业社会”；而当技术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时，人们就会想到“后工业社会”。何况，在恣意谈论“未来”成为时尚而对变化速度却毫无生气地叙述的情况下，对新社会轮廓的设想必然会激发人们的兴趣。如果我成了这股时麾风尚的受惠者，那我感到遗憾。

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后工业社会的观念并不是对未来进行时间准确的预言，而只是一种推测性的描绘，是根据出现的一些特征所作出的一种假定，并以此估计几十年后的社会现实，经过两者的对比，人们就可以设法确定影响社会变迁的运作因素。同样地，我反对把出现的这些特征试图标定为“服务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即使这些要素都存在，因为这种名称是片面的，也许是为了追求时尚而加以曲解。^①

^① 或许主要的误解是认为后工业社会的观念就是指经济中服务业（或第三产业）部门的扩张，而对这种社会的重要性提出质疑。使用这种名称的有些作者（例如，赫尔曼·卡恩）就强调这些特征。有些评论竟然认为我在强调服务业部门的首要性，这不是无知就是对本书的肆意误解。

我之采用“后工业”的词，有两个理由：第一，在于强调这些变迁的间质性和过渡性；第二，在于着重知识技术这个主要的中轴原理。但这种强调并不意味着技术是所有其他社会变迁的首要决定因素。没有一个概念图式可以把一个社会现实描述穷尽。每个概念图式都是在各种特征中遴选某些特征的棱镜，以便突出社会变迁，或者更具体地去回答某些问题。

我们把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和资本主义的概念联系起来，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有些评论认为后工业社会不会“接替”资本主义。但这是把两个按不同中轴所建构的不同概念图式进行错误的比照。后工业图式涉及的是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技术面，而资本主义涉及的是社会—经济面。

此两者之所以混淆，首先是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社会的基层结构）决定并包罗了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由于资本主义是西方社会中盛行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者就设法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等一切领域的社会行为。而且，由于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先进特点的工业化将扩散到全世界，所以最终会出现全球一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况。国家差异将会消失，而最后只有资本家和无产者这两大阶级之间赤裸裸的对抗。

我想，情况表明并非如此。社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整体的性质——不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并不在于经济“基础”，而在于历史传统、价值体系以及全社会权力集中或分散的方式。民主并不能任意“抛弃”，即使它已经开始阻碍资本家的经济力量。^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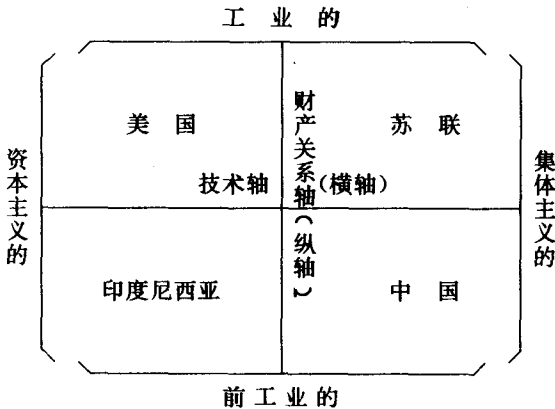
^①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虽然许多资本家确实支持法西斯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来自领导这场运动的失意分子以及构成其群众基础的下层中产阶级。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文化—政治现象。奇怪的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甚至也看不到对苏联本身的新阶级结构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

同样地，当今的西方文化并不是 18 世纪或 19 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是一种敌视经济化方式的现代主义文化，它已经被“文化大众”所吸收，并转变成一种由资本主义自相矛盾地加以推动的物质享乐主义。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把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统一在一个单一的历史标题之下。社会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生产力就是技术力量。然而，同样的生产力（即技术力量）却存在于大量不同制度的社会关系之中。我们不能说，苏联的技术（或化学、或物理学）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或化学、或物理学）。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方面分开，而不认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单一的关联，那么我们对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因此，如果有人问：苏联和美国之间是否存在“趋同性”？答案就取决于特定的中轴而定。这可以用图一来加以说明。

[图 一]



这样，如果我们以技术的横轴来划分一些国家，美国和苏联就都是工业社会，而印尼和中国都不是工业社会。然而，如果我

们以财产关系的纵轴来划分一些国家，情况就有差异，美国和印尼是资本主义社会，而苏联和中国则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或国家集体主义社会。（可是，那种一致却无法解释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为什么存在如此激烈的敌对与紧张。）

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分开，就能指明不同的社会发展图式：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前工业的，工业的和后工业的；或者按韦伯的政治权威架构来分，就是家长制的，世袭的和法制—理性的科层制——只要我们并不声称某个特定的概念图式是详尽无遗的或包罗一切的。在某一历史阶段内，很可能某一特定的中轴原理非常重要，而成为其他大多数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我想，很明显的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方式的社会关系（即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等等）成为流行的精神气质，因此实质上形成了许多特质和文化。但是，这和生产方式始终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主张，是不同的。

生产方式并不能统一一个社会。民族差异并未消失。没有单线顺序的社会变迁，也不存在“社会发展规律”。社会科学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想通过一个凌驾一切的单一概念（不论是资本主义或极权主义）去观察一个社会的特点，使得人们对现代社会复杂的特征（重叠的，甚至矛盾的特征）产生误解，或者设想某一社会制度必然不可避免地接替另一社会制度的所谓“社会发展规律”。任何社会都混和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体系（有些特征是所有体系所共同的，而有些特征则是历史的和特殊的），要根据人们心中的问题，从不同的有利点加以分析。我的重点在于技术的影响，我并不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因素，而作为一种分析的因素，以观察新技术出现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及其政治制度必须设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后工业的”概念与“前工业的”和“工业的”概念是对应的。前工业部门主要是资源采掘的，它的经济是以农业、矿业、林业、

以及天然气或石油等其他资源为基础的。工业部门主要是使用能源和机器技术从事制造商品的。后工业部门从事加工处理，其中电讯和电脑对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极其重要。

近些年来，世界突出地察觉到具有战略地位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已成为工业成长的局限因素，从而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局限是否会影响后工业部门的出现？

对这个问题，有实际的和理论的两个答案：就实务而言，引进资本密集的后工业要素，在时间安排、扩散速度和使用范围方面则取决于其他部门的生产力。工业部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经济剩余；然而，工业化一旦启动，农业部门本身的生产力会通过化肥和其他石化产品的使用而得到增加。同样地，新的信息和处理方法的引进可能由于工业部门成本的提高或生产力迟滞而被延缓，但一旦引进以后，它们就会成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就理论而言，我们可以说后工业社会在原则上是不同于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作为一种理论原理，工业主义的观点并不来自农业方式。同样地，理论知识作为技术创新新基础的战略地位，或者信息在再创造社会程序中的作用，并非来自能源在创立制造业社会中的作用。简言之，分析起来，这些都是独立的原理。

广泛地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①因此，后工业

^① 所谓信息泛指所有经济和社会交换基础的数据储存、检索和处理，包括：a，记录；工资名单，政府福利（如社会保险），银行结算，信贷结算，等等；b，计划表；飞机订位，生产计划，库存分析，产品调配情况，等等；c，人口与图书；普查数据，意见调查，市场研究，知识储存，选举资料，等等。

所谓知识，我指的是通过传播媒体以有系统的方式传递给他人，提供理性判断或实验结果的一套有组织的陈述、事实或思想。（更详尽的说明，请参阅本书第191页及其后的内容。）

部门的社会组织和工业部门的社会组织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可以从对比两者的经济特征中看到这一点。

工业商品是由分开的、可辨认的单位来生产、交换、销售、消费和耗尽的。犹如一条面包或一辆汽车，人们从销售商那里购买这种产品并得到实物的所有权。这种交换是由特定的契约法定条例所支配的。但是，信息和知识并不能消费或“耗尽”。知识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成本、价格或价值的问题大大不同于工业产品的有关问题。

在制造工业产品时，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生产函数”（即：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比例），并根据相对成本来决定各个生产要素的恰当配置。如果资本是劳动的具体体现，我们就可以谈及劳动价值论。

但是，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并不在劳动价值论，而在知识价值论。^①知识的汇集成为创新的导引。可是，知识即便售出，知识的生产者仍然保有知识。知识是一种“集体货品”，一旦创造出来，在性质上就可以被众人取用，因此，除非能得到产权利益（诸如专利权或版权），任何个人或企业都没有兴趣去出资生产这些知识。但是，专利权越来越不能保证专有性，许多公司白费钱在研究上，因为发现竞争者可以很快修改其产品来对付专利权；同样地，当个人或图书馆可以从技术刊物或书籍上复印他们需要的任何部分，或者个人和学校可以收录广播中的音乐，或者把电视节目

① 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提出过类似的论点，他写道：

“……技术和科学 [已经] 成为一个主导的生产力，这使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条件不起作用。当科技进步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而马克思所认为的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即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的作用则日益缩小，那么以非熟练（简单）劳动力的价值为基础来计算、研究与发展资本投资额，就不再有意义了。”（于尔根·哈贝马斯，《走向理性的社会》，波士顿，培根出版社，1970年，第104页。）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知识（不是劳动）是社会产品，马克思关于生产社会性的分析更充分地适用于知识而不是商品生产。

目录制在影碟上的时候，版权问题也就越来越难以监督了。

如果对个人或私人企业无利可图地生产知识越来越缺少吸引力，那么，这方面的需要和努力就日益落到某些社会单位——不论是大学或政府——身上来负担这些成本。而且由于没有现成的市场测试（人们怎么来评估“基础研究”的价值呢？），这就向经济理论提出一项挑战：要设计知识投资的最佳社会政策（例如，应当花多少钱在基础研究上？对教育和对什么领域应给予多少拨款？在医疗的那些方面我们能得到“较好收益”？等等），以及如何制订向使用者收取信息和知识的“价格”。^①

就比较狭窄的技术意义来看，后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一个适当的“基础结构”以开发数字信息的电脑通讯网络（这是安东尼·奥廷格的用语），从而把后工业社会联结起来。社会上的第一种基础结构是运载人员和货品的交通运输，如道路、运河、铁路、空运。第二种基础结构是输送动力的能源公用事业，如石油管道、煤气、电力。第三种基础结构是电讯，主要是电话、无线电和电视。但是，现在随着电脑和资料终端机的爆炸性增长（在美国使用的资料终端机的数量，从1970年的18.5万台增加到1976年的80万台）以及电脑运算和信息储存成本的迅速下降，一个国家如何把信息传输的各种途径连结起来，就成为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大问题。

“信息经济学”的特点不同于“商品经济学”，新的信息网络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从相互作用的研究团体通过电脑终端进行沟

^① 对于集体货品这个问题的创始性著作是曼克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信息经济学”的问题已开始吸引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和迈克尔·斯彭斯的注意。这方面的早期著作，请参阅：肯尼思·阿罗的《有限的知识和经济分析》，载《美国经济评论》，1974年3月号；以及迈克尔·A·斯彭斯的《一个经济学家的信息观》，载卡洛斯·A·夸德拉与安·W·卢克合编的《信息科学与技术年鉴》第9卷，华盛顿特区，1974年，美国信息科学学会出版。

通，到全国电视网产生大范围的文化融合）并不是工业社会中的旧社会格式或工作关系。^①如果这种社会发展起来，我们就会具有与以往大不相同的一种社会结构的基础。

如我已经指出的，后工业社会并不取代工业社会，就像工业社会并不消除经济中的农业部门一样。犹如在羊皮纸上刮去原有文字后重写，这些新的发展覆盖在旧的一层上，消除了一些特征而加厚了整个社会的结构。为了使读者对本书的详细论点有个指南，强调一下后工业社会的某些新的方面，是有益处的。

1、**理论知识的首要性**。每个社会都是存在于知识的基础之上，但是只是到现在才有个改变，理论知识的系统汇编和材料科学成为技术创新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主要从标志着本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电脑、电子学、光学、聚合物）中看到。

2、**新知识技术的产生**。通过以电脑线性规划、马尔考夫连锁、随机过程之类为基础的数学和经济新技术，我们可以利用模型、模拟以及系统分析和决策理论的其他手段，来对经济问题、工程问题（也许不是社会问题）制订更为有效和“合理”的解决办法。

3、**知识阶级的扩展**。社会上成长最快的集团是技术和专业阶级。在美国，1975年，这个集团加上经理人员，占800万劳动力人口的25%。到2000年，技术和专业阶级将是社会上最大的一个

^① 便宜的通讯技术创造出新的社会格式的一个有趣方式，就是利用市民波段电台（译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批准的一种民间小型非营利无线电台，主要用于公路行车联系等方面）作为协作行动的一种形式。在1974年，独立的卡车司机依靠无线电联系，选定一些封锁点，结果在中西部造成绵延上千英里的大范围怠工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和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书中欢快地描绘的江轮引水员交换信息的方式并无多大差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犹如其他许多例子，现代性的特点并不在于行动的性质，而在于行动的规模、迅速和协调性。

这些技术问题的权威性论述，请参阅保罗·J·伯曼和安东尼·奥廷格的专著《传媒与电话：信息资源的政治学》，哈佛大学信息技术与公共政策计划，工作论文第75—78页。对这些以及其他关于信息技术的资料，我非常感谢我的同事奥廷格教授。

集团。

4、从商品变为服务。今天在美国，每 100 人中有 65 人以上从事服务业。到 1980 年，这个数字将是每 100 人中有 70 人。在每个社会里都存在巨大的服务部门。在前工业社会中，这主要是家务仆役阶级。（在英国，1870 年以前，这是社会上最大的一个阶级。）在工业社会中，服务业主要是辅助商品生产的运输业、公用事业和金融业，以及个人服务（美容院、餐馆雇员，等等）。但是在后工业社会中，新的服务业主要是对人服务（主要在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以及专业和技术服务（例如，研究、评估、电脑以及系统分析）。这些服务业的扩展（正如我在第 169—181 页所指出的）成为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和持续通货膨胀的根源。

5、工作性质的改变。在前工业社会中，生活就同大自然的竞争，人类要从土壤、水域或林木中夺取生计，活动往往是小批的，并受自然变迁所制约。在工业社会中，工作是和虚拟自然进行竞争，当机器生产出商品和东西时人类就相形见绌了。但是在后工业世界里，工作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官员和当事人之间，医人和病人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或者在研究团体、办事机构、服务团体之中）。因此在工作经历和日常事务中，自然被排除了，人造事物被排除了，人们必须学会如何相处。在人类社会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没有类似的新情况。

6、妇女的作用。工业部门的工作（例如在工厂）主要是男人的工作，妇女往往被排除在外。后工业部门的工作（例如对人的服务）对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可以说，妇女第一次得到了经济独立的可靠基础。我们可以在妇女加入劳动力人口的稳定增长曲线上，在有一个以上正规工资收入者的家庭数量（现在占总数的 60%），以及在妇女日益感到经济上无需依靠男人而离婚率上升中看到这一点。

7、科学的蜕变。回顾 17 世纪的科学群体，是人类社会的一

个独特组织。它具有超凡感召力，因为它在寻求真理上是革命性的，在方法和程序上是公开性的；它的合法性来自它的信条，即科学的目标是知识本身，而不是任何特定的实用目的。它不像其他有超凡感召力的群体（主要是宗教团体和救世主式的政治运动），它并没有把自身的信条视为“常规”而强制推行一些正式的教条。直到最近以前，科学并没有碰到研究工作官僚化、研究工作从属于国家指示的目标，以及研究结果要根据实用报酬来“审核”等问题。现在，科学已经不但和技术而且和军事、社会技术、社会需要等密不可分。所有这一切就是后工业社会的中心特征，是这个新科学组织的特性，对于未来的自由研究和知识是极为重要的。

8、工作地点成为政治单位。大多数社会学分析集中注意阶级或阶层，注意那些相互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的社会横向单位。然而在后工业部门，一套纵向次序的工作地位很可能将是政治关系的更重要场所。在本书第406—407页，我叙述了这种后工业格局的可能工作地点。有四个职能性工作地点——科学的，技术的（即工程学、经济学、医学等应用技术），行政的和文化的——以及五个体制性工作地点——经济企业，政府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社会机构（例如医院、社会服务中心），以及军事部门。我的论点是，主要的利益冲突将是在工作地点集团之间，同时，对工作地点的强烈归属感将会阻止新的专业集团在社会上组成一个坚实的阶级。^①

9、能者统治。后工业社会主要是一个技术社会，奖酬较少根据继承或财产（虽然这些能掌握财富或文化优势），而较多根据教

^① 令人惊讶的是，在共产党世界里，工作地点很明显地在政治中起主要作用。人们分析其权力运作时，不是根据阶级，而是基于党、军方、计划部门、工业企业、集体农庄、文化机构（这些都是工作地点）之间的对立争夺。